

2014年对我来说有两件大事，一是重新回到了喜羊羊团队，开始创作剧本。团队跟之前相比有了些变化，人多了，品牌产品也多了。2008年我离开了喜羊羊团队，创立自己的公司。现在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已经有1000多集了，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但是目前却面临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品牌下一步怎样走，因为每一集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那么我们继续做喜剧、童话，还是加一些复杂的东西？

当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回来了，也应该回来。经过讨论和研究，这些问题终于有了答案，那就是调整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电影的内容，将它回归到喜剧，不要太复杂。但是未来可以进行一些趣味性的尝试，比如下一步会考虑做喜羊羊的远古时代，做不同的喜羊羊系列，而不是成人化，只要给大家带来简单的快乐就好，这是它的初衷，不要改变了。

说起2008年，之所以离开喜羊羊团队成立自己的公司，是因为遇到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可以做科幻系列，创造新的品牌。就这样开心超人，开心宝贝做起来，现在一共有300集的动画。并且在2014年的暑假档上了大屏幕，这是我2014年做的第二件大事。因为对于我来说，它是不同于喜羊羊的品牌，属于科幻类，相对于喜羊羊的童真，它是稍微复杂一点的。我们会跟大集团的电影相比，排片优势很少，影响到票房。

我也会因此而沮丧，但是有一天，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张照片，有很多年轻人在看《开心超人》这部电影，我就很欣慰了。只要有人认可，一切努力就没有白费。

这种感觉，让我想起很多年前，我做的第一部片子，叫《宝贝女儿好妈妈》，那时候真的很辛苦，一个人做一集动画，从美术到布景，都是一个人在承担。这跟现在的《喜羊羊》不一样，那时候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怕片子观众不喜欢，怕自己的努力白费。但是直到有一天，《宝贝女儿好妈妈》参加一个动漫展，有一个小男孩，指着动画人物叫出了他的名字，我当时非常感动，一下子就流泪了。那不是个常见的动画人物，而是在动画片最后才出现，只有几秒钟的镜头，是配角中的配角，他怎么会记住了？这是对于创作者最大的欣慰。困难是不会让我流泪的，只会让我更坚强，但是看到作品被认可，受到欢迎，真的是忍不住感动，这也是支撑我走到现在的动力。

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动力，就是我的女儿。回到《喜羊羊》团队中，每天都非常忙，不停讨论内容，创作剧本。但是一回到家，看到孩子就会觉得很快乐，工作的焦虑也忘记了。她很童真，会画画，会学大人说话，也会恶搞，给我一种很安全的感觉。她会像一个观众，坐在我旁边看我做动画，我常问她喜欢吗？她就会一直点头哈哈大笑，我会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做。

2015年，《喜羊羊7》就会跟大家见面了，同时，《开心超人》的电影也会在暑假档推出，我会把这个品牌做好，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困难是一直有的，比如人家背后说坏话，比如市场环境的恶劣，但是我喜欢这个品牌，就要坚持做下去，不能被困难打败。放弃的理由太多了，有千千万万，但是坚持下去的理由很简单，那就是喜欢啊，每当遇到困难，我就问自己喜欢不喜欢，然后什么都不管，一根筋走下去。

宫崎骏拿金奖，不是因为他推销得有多好，而是因为他的故事太打动人。我不敢想会做出宫崎骏那样的动画，但我希望大多数人喜欢，能够多些人点赞就可以了。（著名漫画家，动画片《喜羊羊》之父）

本报记者 陈玮 采访整理

我是黄伟明

只要能带来简单的快乐就好了



我是刘兰芳，一名评书表演艺术工作者。

虽然我已经70岁了，但2014年，我演出超过90场，义演的脚步往南到过三沙，往北到过黑瞎子岛，进过潜艇，钻过山沟，登过辽宁舰，常去敬老院。印象最深的是11月15日，16日，参加了中国文联在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举办的文艺志愿者义演活动，那里零下十多度，道路崎岖难行，但我们给森林场职工表演得很认真、很高兴。

2014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，也是我五十多年艺术生涯中一件无比重要的大事，就是参加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。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很多要求，特别是“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、一千条，但最根本、最关键、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、扎根生活”，让我有极大的共鸣。文艺一旦离开人民，就会变成无根浮萍、无病呻吟、无魂的躯壳。总书记说得最多的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说到我们心里去了。

最近，我又写了一部百集广播评书《花果山传奇》，是以吴承恩、施耐庵、罗贯中、李汝珍、吴敬梓等文坛名人逸事为主线的。要说我新年有什么样的打算，总书记要求我们要宣传爱国主义，多出好作品，我现在很清醒，我要多写新书、好书。（中国文联副主席，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，国家一级演员）

本报记者 张榕博 采访整理



我是郑晓龙

其实我不愿意拍中国人窝里斗

说到中国影视作品“走出去”，我想说，我不愿意拍中国人窝里斗，我希望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，东西方文化上的冲突。当年我跟姜文合作的《北京人在纽约》得到了大家肯定，姜文其实还愿意再拍《北京人在纽约》，是他跟我说的。只要他愿意，我下面再弄个《北京人在纽约》的全本就找他，尽管他的年龄稍微偏大了一点点，这个都可以解决。

2014年，有些电影收获了高票房，我弄不明白。举个例子，《变形金刚4》在中国20亿的票房，然而在美国被批评得一塌糊涂。我觉得特别尴尬，我感觉中国的观众极不成熟，太好糊弄。还有些韩剧，弄得中国小姑娘、小伙子五迷三道。我特别怀疑，韩国人真的是一个个都从一而终、对爱情至情至性？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电视剧里的中国人还比较真实一点，表现出中国人的那种复杂。韩剧里的生活是真实的吗？我对这个产生非常大的怀疑。我觉得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，才是文艺作品的大主流。

2015年，我主要的工作是《芈月传》的后期制作。《芈月传》这部戏已经定档2015年12月8日开播。《甄嬛传》完了之后，别人说你再拍哪个古装戏？我一点都没兴趣，但是对芈月，我有点兴趣。芈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政治家，在她之前，秦孝公商鞅变法，到她这儿坚持变法，坚持国家统一，做了很多事儿。她死后30多年，中国统一。甄嬛是一个虚构的女人，而芈月是真实的，而且不为人知，有很多可以创作的余地。（著名导演，代表作有《渴望》、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、《金婚》、《甄嬛传》等）

本报记者 张亚楠 采访整理

我是陈佩斯

我会坚守在舞台喜剧一线

我是陈佩斯，一名喜剧演员。

2014年和2015年，北京喜剧艺术节迎来第四季，当初我发起这个活动，就是想着喜剧是一个兴盛的艺术，笑声是人类社会上升的表述，而嘴角向下，是我们低落、衰败甚至灭亡的表达。作为一名喜剧演员，我有责任和义务带给观众更多的欢笑。

大家都知道，这一届的喜剧艺术节在以往剧目展演的基础上，又增加了喜剧剧本征集、喜剧调研、喜剧论坛等系列活动。不过，喜剧剧本的征集不理想。现在的人都浮躁，坐下来写剧本很困难。每年电影学院、戏剧学院报考表演的人成千上万，但愿意学编剧爬格子的人寥寥无几，这是让人非常忧虑的事情。没有好的剧本，就无法创造导演出好的剧目。

2014年最让我高兴的事，就是成功开办了首届喜剧论坛，许多老朋友前来捧场，一起探讨喜剧未来发展之路，这是我一直想做且也想做好的事儿。我们想除了自己做好，最重要的是年轻人也要有发展前途，他们需要指导。有一次我去上海演出，得到了一个特别中肯的评价，我看到之后感动得热泪盈眶。现在的年轻创作者就像我们当年一样，一直在喜剧中摸爬滚打，希望他们能取得成功。

2015年，我将继续坚持在舞台喜剧一线，带领我的学生，给观众带来更多好看的剧目。

另外，睽违大银幕已久，我将与朱时茂再度携手，在2015年1月16日即将上映的《谋·莲花》中为观众献上精彩表演。大家都都看到了，最近片方曝光一组我的剧照，希望观众们喜欢。（国家一级演员，中国著名喜剧演员）

本报记者 贾凌煜 采访整理

由我编剧的《北平无战事》2014年播出了。这部戏是我写得最久的一部戏，整整用了七年时间。七年时间写了一部小说一部戏，它确实是很难。

很多人都说难得啊，今天能这样做。我总觉得我比别人多了一条命，多了一条艺术生命。除了我的肉体，艺术作品能流传下去也会影响很多人。我也可以利用这七年去搞别的钱。无非是房子住得更好一点，车开得更高档一点。那个有什么用呢，是吧？个人追求不同吧。

当初有人想给《北平无战事》投资，看了剧本之后，他们最担心的是这部片子里表现的反贪腐。他们担心，你这个会不会让人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腐败现象。这部戏从2013年开机拍摄到2014年播出，所有的形势都特别适合，中央说反贪腐比我说得还厉害。

但这部片子主要的不是政治诉求，而是文化诉求。

我一般都是从历史文化形态看问题，不会局限在哪个断代史、哪些人物、哪些事件里面。

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中华民族正处于最大的文化转型期，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，每一个人都从家族文化向社区文化转型，是吧？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突然发现，我们背后没有文化。我这部《北平无战事》，更多想唤起大家对文化的回忆和感觉。让大家感觉到民国时候的文化形态，到最后感觉到，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代国民党，带来一种新的文化形态，会引起大家很多思考。

今天电视台播电视剧的风气，已经培养了一群不动脑子光看热闹光看娱乐的观众。这些东西，第一不担风险，第二投资成本低，第三周期快，形成了社会群体，在文化品位上集体下沉，这就是现实。今天是个物化的年代，不是文化的年代。大家都在比谁的手机更好，谁的包更好，谁的衣服更好，谁的车更好，谁会跟你比谁的文化更好？就包括一个戏里面，谁能把广告植入进去更多，谁就更好。

后人会来研究我们的今天，不能只留下一堆打打闹闹的东西，总得筛选下来一些有文化内涵有艺术追求的东西吧？我这个年纪的人，经历了这么多的事，有一种责任，通过艺术作品，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升华，这是文化转型期最应该做的事。（著名剧作家，历史学者，《北平无战事》编剧）

本报记者 魏新丽 整理